

第一辑 生命符号“梦” “坟”与“挣扎”

童年的梦

作为书斋里的学者，整天在历史的尘埃中爬梳，心境也变得苍凉。可是有一天，突然从灰黄的纸页——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《中央日报》“儿童周刊”上发现了自己的“童年”仿佛是沙漠中的清泉，晃动得睁不开眼。那分明是自己的名字：“中大附小钱理群”又是那样一个诱人的题目——

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

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，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，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！那带子般的河流，世界上最长的长城，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，烦嚣的上海，风景幽雅的青岛，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啊！

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，一定要飞到空中去和小鸟、蝴蝶舞蹈，和白云赛跑，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，去拜访月宫中寂寞的嫦娥，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。可惜我没有翅膀，

假如有了翅膀，是多么有趣啊！

一个九岁孩子的“梦”，但又是怎样地牵动着我的生命的旅程 多少次飞翔 又坠下 多少回挣扎与失落！

如今再也飞不动了，却又面对着这生命的重新扣问：
“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……”

假如……假如一切从头开始……

我将再一次选择飞翔。

同时准备着它的跌落——更沉重的跌落！

1993.5.17 急就于北京燕园

一切都从那时开始

本年初收到了一封信，一看信封地址，手就微微一颤，是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寄来的。待读到信中开头几句话：“今年是本校少年先锋队成立 40 周年 你是第一任大队长……”心头竟滚过一阵热浪，久不能息。我知道如果就此信笔写下回忆，定是前言不搭后语；想稍压一时，不料竟至近半年时间。此时再提笔，也仍不免颠三倒四，一点办法也没有……

该从何说起呢？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，是要纠正信中的一处错误 我们当时建队的名称是“中国少年儿童队”大概后来才改名为“先锋队”的吧。名称自然并不要紧，对它的实质的理解也许更有意义。说起来当时的观念也很简单、朴素：“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翁 少儿队是我们自己的

组织。”这种主人翁感是建国初期的时代情绪，今天回味那处处以小主人自居的劲头，仍怦然心动。于是，成立学生会（这大概是为建立少儿队作准备）也不愿由老师指定，而先要“竞选”一番。我被班上同学推为候选人，自己发表竞选演讲不说，同学们还组织了竞选团，到处张贴标语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竞选团的小伙伴们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制作了一条大横幅，写着“请投钱大头一票”几个大字，这是用我的外貌特征来吸引“选民”。我的竞选对手自不甘落后，第二天也挂出“请投丁大鼻子一票”的横幅，不过轰动效应已减少了很多。也许是我的演说词动人，也许是因为竞选方式新颖，最后，我以多数票当选了。学生会成立，自然要组织许多活动。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曾引起很大反响的演戏。演的第一出戏，是由我和同班女同学钱平凯（她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）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话剧《一群流浪儿》。这是反映旧中国儿童不幸遭遇的悲剧，我演小牛，平凯扮小凤，还有一位仿佛叫陈明的女同学演瞎了眼睛的姐姐，演得十分动情，每次演出都“赚”了观众（包括老师）不少眼泪。从此，我和平凯都成了“三名”（名编剧、名导演、名演员）人物。为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，又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《大家都来买公债》的短剧，到江苏省广播电台广播演出。以后，还演过名为《红孩子》的童话剧，主角红孩子自然是我，还有白孩子，黑孩子……等等。学生一带头，老师们也跃跃欲试，好像是由当时教国画的杨鸿仪老师主持，排演了一出大型哑剧《和平鸽》，我这回自然当不了主要演员，只扮了一个小地主的反面角色。演出后的合影，我至今还保留着，算是永久的纪念吧。以后大概就是筹备少年儿童队的成立了。记得当时

主要是进行“五爱”教育（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劳动、爱科学、爱护公共财物），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，每一次有一个中心主题。把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统一起来。例如，在“爱祖国周”语文课选读有关文学作品，历史课讲祖国历史，地理课介绍祖国地理，课外活动举行歌颂祖国的诗歌朗诵会、演讲会等等。这些活动都强调学生自我教育，我们这些学生会、少儿队筹委会的头儿都是直接参加了组织、领导工作的。学校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大概是在 1949 年底。记得我们学校是南京市最早成立少儿队组织的，在我当选第一任大队长后，还到许多学校去介绍经验。有了自己的组织，学校的活动就更频繁，也更有生气了。印象最深的是所谓“小先生”活动：将住在学校周围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（这种因要负担家庭不能读书的儿童在解放初期是不少的），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课。记得我被推为“小先生学校”的首任校长，还煞有介事地正式聘任了班主任、任课教员等等。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，记得有一位姓徐的四年级女同学，担任“小先生学校”一年级语文教员，她上第一堂课，打开书就哇啦哇啦念课文，也不管学生是否接受，不到下课时间就把一册教科书教完了，不知下面该怎么讲，就丢下学生，哭着跑来向我这位“校长”“请示”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一起去请教老师，即我们的学生的“太老师”。后来学校大概就逐渐走上了正轨。记得有一位卖冰棍（南京叫“冰棒”）的学生，毕业后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我，上面写着“敬爱的钱老师留念”几个字，这幅画我一直珍藏着，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，真有些可惜——尽管我现在是大学教授，学生已算不少，但最令人感怀的，还是这

位学生和他的感谢 因为这毕竟是“第一个”。

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，而且是那样的美好，它给我留下的记忆与影响是真正刻骨铭心，融入血肉的。真的，不管人生路上会遇到什么曲折，我始终坚信：人生是美好的，青春是美好的——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人生，那样的青春。

1989年6月21日

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

一只青翠的小鸟轻轻地落在我的书桌上。

——我在读 92 岁的冰心老人的近作《我梦中的小翠鸟》：

“我梦见：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的车里……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。我伸着左掌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。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，绿得醉人！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。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，毫不相称……”

历经万般劫难，还能有如此绚烂、宁静的梦，这实在令人羡慕。

而我又感到几分惆怅：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做这样的梦了！？

……那埋在记忆深处的如花似梦的岁月被悄悄地唤醒，想起校友会的来信，说明年是附中 90 周年校庆，要我“写点什么”我突然有了题目 连忙摊开稿纸 信笔写下给母校的献词。——

“感谢您让我自由地做梦……”

是的 附中最令人怀想的 就是“自由”。首先是有许多闲暇的时间，让学生自由地做自己愿做的事，读自己想读的书。那时的功课不能说不紧，附中老师要求严格是早已出了名的；但在我的印象中，需要掌握的知识在课堂上就消化了大半，作业顶多个把小时就可以完成——只有作文 我每回都要写好几天，不过那是兴趣所在，自愿加班加点，不在此例。剩下的时间 就是“玩”——玩个人之想玩。我于是就读书 读闲书 各式各样的 漫无边际 抓到什么 就读什么 没有目的 完全是兴之所至 过瘾似的 翻下去 翻下去……翻累了 放下书来 就自己想 风筝断了线似的 任思想自由地驰骋，有时候就接着作者写的，继续想下去，设想书中的人物活到今天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，怎样说话，如何行动……想得兴奋起来，就信笔写下，也不管写的是诗，还是小说 反正是“我自己的”就是了。欣赏者也是自己一个人，从不给别人看。往往开始要陶醉好几天，一再地拿出来偷偷朗读 摇头晃脑的 渐渐地就厌倦了 不满意了 甚至害羞了。其结果可想而知：揉成一团悄悄扔掉了。也不觉得可惜。久而久之 甚至忘掉了还写过这样的“作品”……

有时候，上课时，也这样胡思乱想，即兴创作。记得高中语文课讲《春蚕》，我突然对小说中的荷花产生了同情与兴趣，很为作者写得过于简略而感到可惜与不平，干脆自己编起来，写了一篇“荷花的故事”。我的这种“改作”（“扩写”）似乎是得到老师鼓励的，甚至是老师启发的产物。记得高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高鸿奎先生（他在肃反时曾被隔离审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活活打死！就出过一个作文题，

要我们将鲁迅先生《药》里的侧面刻划变为正面描写，重写一篇《夏瑜的故事》。光是这个题目就让我兴奋不已，花了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，读了许多有关书籍，甚至对大清刑罚也作了一番“考证”，最后写成了一篇万把字的短篇小说《夏瑜之死》。这不仅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，甚至是我的学术研究的起点。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即所谓不自觉的创作与研究，其可珍贵之处也恰在于此。

这就说到了附中的老师。附中之为附中，就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教育家。不同于一般的教书匠，他（她）们不是向学生强制灌输知识，而最懂得如何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。在我看来，最神妙的是，附中的老师不论教哪一门学科，都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满足学生的好奇心。鲁迅说过：“孩子是可以敬服的，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，想到花卉的用处，想到昆虫的言语；他想飞上天空，他想潜入蚁穴……”这里说的是青少年探求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，附中老师的魔力就在于他们善于发现学生处于萌芽状态的求知欲求，加以精心的培养与引导，他们的教学也就成了一种艺术。在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心目中，我们所信服的老师都是这样的艺术家；我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“化学”周（兴发）——我们私下都这样称呼老师及“化学”叶（少龙）在课堂做实验演习时，让我们感到他们是在做化学魔术，把我们带入了莫测的魔幻世界；“生物”余（仁）讲达尔文主义，我们都仿佛成了探险家，跟着达尔文老人漂洋过海到处采集标本；“数学”陶（强）凭着几块几何模型，仿佛今日孩子手里的“魔方”似的，让我们的想像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；还有“历史”张（我们）已经忘了他的名字，听说

他后来被当作“伪蒙特务”抓了起来。在课堂上讲《圣经》故事，讲希腊神话，我们听得如痴如迷……那时候，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神的探险，都会发现“新大陆”。我们总是怀着极强的期待感，以至某种神秘感，走进课堂，渴望着在老师的指导下闯入一个又一个科学的迷宫，解开一个又一个宇宙的奥秘……记得在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，我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，第一条就是“学习要有兴趣，要把学习每一门功课当作精神的享受，这是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”；我的这一体会曾得到了叶少龙老师的充分肯定，认为是说到了“点子”上，或者说这是师生共同的理解与追求吧。我想，附中学生成绩一直保持优秀，这大概也是一个关键。

在课堂上培养的创造性思维能力，唤起了创造冲动，又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得到更加自如的发挥。记得我一个人就参加了化学协会与戏剧协会；后者让我的艺术想像力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我已经记不清在中学时期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多少出话剧和曲艺节目，每一次创作与表演的成功，在我的感觉中，都是一次精神的升华，我终于做起我的教师梦、作家梦与演员梦来。当然，做梦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我们全班同学，我们这一代人……

……登理，还记得吗？每星期六下午，我们都要避开班上同学，偷偷地溜到玄武湖，租一条小船，划到荷花塘深处停下，编造起我们自己的童话来。我写，你插图，题目就叫《神剑》。讲一个勇士探宝的故事。后来，我还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。在蓝天、白云、盈盈湖水、田田荷叶的包围中，我们的心变得纯净而柔和，仿佛要融化在这美妙的天地之中。

.....

.....敦荣，你还记得吗？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学校后山上，几乎走了一夜，谈了一夜。我像往常一样，高谈阔论，有声有色地描绘自己的“儿童文学家”梦，而你呢，照例沉默着，偶而也细声细气地述说自己要当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的梦。如今你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，而我还在继续地做“梦”.....

我们这批同学，我们这一代人，走出中学时代，就遇到了以“反右斗争”为开端的历史大动荡、大曲折。

谁曾料想，在中国，竟然会出现不许做梦的时代！但这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。大学期间，我的作家梦被当作“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”受到严厉批判。从那时起，恶梦就一直纠缠着我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为了驱走这心中的恶梦，我曾写信给中学时代的老班长韩品嵘（品嵘，你现在在哪里？），诉说我的苦恼。他后来专门约我到颐和园玩了一次。暑期在南京聚会时，他、庆象和我还特地到紫金山山脚重温旧情，我们仍然孩子般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手折的纸船上，放它顺流而下.....但我们已失去了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，即使笑，也是苦涩的。我们分明感到，童年金色的梦再也不能拾回：它已经破碎了.....

最近，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，我重读了别林斯基的一段论述，对这段历史似乎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别林斯基指出，青年时代是人的“精神幼年时期”¹⁰¹，他不过是美好的灵魂，但远不是实际的、具体的人¹⁰²；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裂¹⁰³。将看到“生活的梦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同一的东西”¹⁰⁴；这就是说，即使中国 50 年代以来不发生历史的曲折，梦想的破灭

也是必然的 这是“幼稚的、不自觉的精神和谐”向“不和谐与斗争的过渡”；但也如别林斯基所说，这种“不和谐与斗争”最终仍将走向“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”。周作人说得好，“梦想是永远不死的。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，虽然他们的颜色不同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，但终究要回到她的怀中来。”

于是 在两鬓斑白之时 我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梦的怀抱。仿佛是鲁迅所说的“朝花夕拾”，我重新“拾”起了中学时代的“梦”，不是怀旧，而是要在有限的年月将它一一实现。我对朋友们和我的学生开玩笑似地说，我这些年的工作，无非是在“圆梦”——尽管教师梦早已实现，但只要想起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，我如今每次走上北大的讲台，仍然怀着一种神圣感，仍然充满着内在的激情；去年，在一场大病之后，我写了一部关于曹禺的书，这是中学时代戏剧梦的现实化；现在，我又把目标转向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研究，我还在迷恋着当年的儿童文学梦。

我知道 我依然活得沉重 苦恼以至恐惧依然纠缠着我的灵魂，我远没有达到冰心老人那样的灵魂的和谐，那将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生境界。

但我仍然梦想着 有一天 这只青翠的鸟会飞入我的梦境。

你看，它已经站在那里 安详而宁静。

1991 年 11 月 3 日

离题的追念

因为写了几本书，于是有人称我为“学者”，但我却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“老师”。

老师 更是我的钟爱 我的追求 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。有朋友说 听我讲课 比看我的书 印象要深刻得多 这大概是有道理的。我的学术著作，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，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：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，那滔滔不绝的语势，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……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。更有意思的是 我的研究 竟也遵循着“教学相长”的原则。青年朋友（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），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，又是共同创造者，更准确地说，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。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，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：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，获得灵感，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，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；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想法，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（熟识的与不熟识的）倾诉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，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，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，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。因此 待到一切成竹在胸 奋笔直书时 我所写下的 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。至于在讲课过程中，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，更是常有的事；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，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，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。我常说 离开了青年朋友、学生 我将一事无成 这

绝非夸大之辞。

文章写到这里，我才发现，自己的笔早已离题千里。写本文的目的是要追念我的启蒙老师，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，大石桥南师附小的吴馨先生，但我竟然没完没了地分析自己。

我又似乎没有离题。因为我的教师职业兴趣是吴馨先生培养的，我的教师气质也是吴馨先生发现的。

可我却又无法具体地说出：吴馨先生是怎样发现与培养了“教师”的“我”。我甚至对吴馨先生言行的记忆都已模糊，无法一一写出他对我的种种教诲；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，却是吴馨先生炯炯的目光，幼年的我常常在那里看到了令我神往的热情与坚毅。在我成为又一个“先生”时，我才懂得，那热情与坚毅，来自先生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事业的挚爱与自信。而让我永远难忘的是，有一天，这闪动着热情与坚毅的目光对准了我。先生对我说：“学校办了小先生班，教学校附近的失学儿童识字，你去上课吧！”再没有更多的话，先生就走了，只留我一个人愣在那里。直到十多年后走上真正的讲台时，我才明白，先生不多说一句话正是一种真正的教学艺术，其实我在当时就已经从中感受到了先生对我的绝对信任，进而自己战胜了内心的胆怯，毅然担起了“小先生”的重任，而且这重担一直肩负到现在。

我对吴馨先生的追忆，仅此而已。别的什么，几乎已无记忆。先生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，至今仍让我追怀不已的教诲，他对我的影响是了无痕迹的潜移默化；而这，正是教师的全部魅力所在。

于是，我对先生的追念只能离题，不断地说我自己，而说

我自己也正是在说先生 因为先生的一切已经内化在我的身上了。

1991 年 12 月

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

人们一入老境，便时有怀旧之想。今年以来，我就一直陷入对老师的怀念中不能自拔，总想写些什么，却又不知从何写起。而且我要坦白地承认，我最急于偿还的还不是指引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王瑶师的恩情；我要向我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献上我的感激与忏悔。他的声名远没有王瑶师那么显赫，他至今还默默无闻地在一间小屋里作着生命的最后挣扎 除了少数亲友、学生 人们很少谈论他 但在我，他却是挺立高山之上的伤痕累累的一株大树，并时时给我以心灵的重压……

他，便是曾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幼儿师范任教的卢冠六先生。

记得是刚进入初中二年级的那学期，班上同学风传将要调来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儿童文学家，这在崇拜名人的中学生中自然引起了许多猜想。但在久久期待后终于出现在面前的卢冠六先生，却使我们有几分失望：矮矮胖胖的身材 朴素的衣着 都与我们想像中的“作家”不大相符 只有那高度近视的眼镜，以及时时露出的慈祥的微笑，让人想起儿童读物中经常出现的“讲故事的老人”。但我仍不敢接近他，不知道是因为敬畏还是胆怯。一次作文课上，卢老师出

记’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冲口而出：“我们能行吗？”老师又笑了：“怎么不行 就跟平时作文一样写 当然，也还需要一点‘虚构’、‘想像’。”卢老师仿佛故意不注意我们的惊喜、疑虑，只是像平时讲课那样，细细地给我们讲授起创作基本常识来。我于是在卢老师的具体指导下，如痴如迷地写“书”了。从此 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，我于是时时沉浸在难言的创造的发现与喜悦中。尽管这本书后来因为书店的变迁没有能够出版，但这创作的、也是生命的全新体验却永远地刻在我的心上，从此与笔耕生涯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缘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在学校老师与同学心目中，我成了卢老师的得意门生。但谁能料到这种亲密关系竟会引出灾祸！记不得是 1954 年下半年 还是 1955 年上半年 学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，正色告诉我：卢老师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，并且态度顽固，不肯交待问题，组织上要求我以先生最喜爱的学生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，对卢老师进行规劝。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对所说的一切，我不敢相信，却也不能不相信。一边是卢老师，一边是组织，我的选择必然是悲剧性的：我终于出现在批判卢老师的大会上。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什么，只记得在我发言以后，卢老师被迫站起来表态 表示“感谢同学对我的帮助”但我却从他偶然扫向我的眼光里分明看出了他的失望 我慌忙溜了出来 并且再也不敢接近卢老师。他那失望的一瞥鞭打着我幼稚的心灵，从此失落了少年时代的单纯与快活，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。后来卢老师调离了我们学校 只听说他的境遇越来越坏 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去看望老师，却又因此而不断谴责自己的

软弱：这生平第一次心灵的受伤，似乎永远也无法治愈……

以后的路是漫长而痛苦的。我时时想念被我无情无义地伤害了的恩师，却再也没有和他通过一次信。直到……前几年我们在他那间破旧的小屋再见时，他已双目失明。但他一听见我的声音，就立刻认出了我，紧紧地拉住我的手，絮絮地告诉我，这些年他如何到处打听我的消息，仿佛已经忘记了不愉快的过去。我却不能忘记，一边听老师讲话，眼前浮现的却是那难堪的一幕。老师却看不见我悔恨的若有所失的神情，继续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已经平反，解放前夕，他听从地下党的指示，劝说上海许多中小学校长留在大陆是有功的；又突然说起他当年的创作生涯：早在 20 年代末 他就写过《自学成功者》等故事和三卷《小学剧本集》（与他人合作）三四十年来 先后出版了《昆虫的生活》、《晨钟之歌》、《胜利之歌》等儿童故事诗歌，50 年代 又编写了大量儿童故事、谜语，并受教育部委托，起草了师范学校儿童文学教学大纲 直到现在 还在写回忆性散文 收在《金陵野史》一书中……他说得这样急切，怕我听不懂，又用笔在纸上写着，尽管字迹互相重叠，几乎无法辨明，但他仍然塞给我，要我好好保存……看着这位从 20 年代起就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老人，想着我对他的伤害，我说不出一句话，拿着他手写的创作目录，有如捏着一团火烧灼着我的心。我依然是“逃”了出来，老人还追在背后呼唤我“再来”……

去年的深秋，我们又见了一面：老人神志已经不甚清楚，但仍然记着我，用他干枯的手握住我久久不放。此刻，我仿佛还感觉到他的手温和他永远赐给我的爱。而我将何

以报答呢？我只能如实地写下我的过失与悔恨，以此告诫年青一代的朋友——

千万不要伤害你的老师！不管用什么形式，自觉还是不自觉，那将是永远不能原谅的罪过！

1990年5月24日

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

电话里传来遥远而亲切的声音：是吕鸣亚老师。他告诉我明年是他的七十大寿，想出本纪念集，希望我写篇序。

我一时竟反应不过来：我不能想像，吕老师也已进入了人生的“老年”。继而一想，又不禁笑了起来。可不是么，连我自己，都已经年近花甲了！岁月真的不饶人啊。

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吕老师又是确乎永远年轻的。

初见吕老师是1950年中期，我正在附中念高中，吕老师新分配来担任我们的俄文老师，并且很快获得了大家的信任：在同学们的眼里，他简直就是我们的大哥哥，不像那些著名的老教师那样令人敬而远之，他和我们一样年轻而无距离。

再见面时，已是十年浩劫以后，吕老师代表附中校友会参加我们56级在京同学的聚会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的简陋的宿舍里，吕老师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校友会的活动，讲得那样的动情、忘我。面对因此而容光焕发、神采奕奕的老师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是把校友会的工作，当作自己事业、理想的寄托，而将整个生命投入的。我深深地感